

东南亚中国新移民：流变机制、结构张力及代际转型*

董向芸, 徐 榕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流变机制、结构张力及代际转型等方面呈现多元转型, 进一步分析, 政策导向与制度环境对移民流向的引导, 东南亚各国签证政策漏洞成为“制度套利”的关键动因, 宗教冲突与文化隔阂阻碍移民的社会融入、经济机会无法消除非经济制约、跨国网络“脱域-再嵌入”系统变迁等则成为影响移民群体结构分化的主要因素, 与此同时, 中国移民新生代还通过教育与职业重构来实现阶层跃升以及深层次推动中华文化在地化发展。研究构建了多维分析框架, 可为移民代际演进及区域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结构张力; 代际转型; 流变机制

[中图分类号] D523.8; D820; C9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5) 04-0076-10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4.009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移民治理领域的政策互动呈现出显著的制度性张力, 这种张力源于中国移民政策的渐进式开放与东南亚国家签证制度结构性缺陷之间的动态博弈。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中国通过《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1985 年) 确立“准许出境”原则, 至 21 世纪初逐步构建起包含按需申领护照 (2002 年)、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家扩展 ADS 制度等多层次的移民政策框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东南亚部分国家签证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的监管滞后性, 2022 年泰国旅游签证允许 60 天停留期并可延期 30 天, 2021 年修订案菲律宾落地签政策支持入境后直接延长至 30 天。这些政策组合形成了“制度梯度差”, 不仅为新移民群体提供了合法的入境通道, 更通过延期机制与逾期滞留的灰色地带重构了迁移路径, 最终深刻影响了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规模结构与定居模式。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区,^①区域内的移民流动是东南亚移民的一个显著性特征。^②从移民构成上看, 中国新移民主要由留学人员、非熟练劳动力、商务移民、劳务人员和非法移民组成,^③东南亚区域内的移民主体仍然是低技术劳工移民。^④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而言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含义, 中国的崛起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了文化上的复兴,^⑤在华人新移民人数增长的同时, 东南亚一部分华人群体内部出现“再华化”的现象。^⑥在新移民治理方面, 东南亚移民治理困境的症结主要在于问题本身的复

* **[作者简介]** 董向芸, 女, 云南昆明人,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边疆社会治理、教育与社会发展; 徐榕, 女, 云南曲靖人, 云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边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移民海外聚居点调查研究与动态数据库建设”(23&ZD206)子项目。

① 韩晓明. “移民—扩散型”语言传播及其特征: 以东南亚汉语传播为例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3): 168-176.

② 谢婷婷. 东盟区域移民治理的规范演进及其影响 [J]. 东南亚研究, 2024, (3): 23-43.

③ 庄国土, 张晶盈. 中国新移民的类型和分布 [J]. 社会科学, 2012, (12): 4-11.

④ UNESCO Office Bangkok and Regional Bureau fo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UN-Habitat. Internal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owards better inclusion of internal migrants; key messages & recommendations [R]. Bangkok: UNESCO, 2018: 1-15.

⑤ John Wong. Some thoughts on the emerging “NewHuaqiao”, East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iaspora and Impact [M].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0: 8-14.

⑥ 刘宏. 中国崛起时代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 变迁与挑战 [J]. 东南亚研究, 2012, (6): 66-72.

杂性、治理体系松散、多议题挑战及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等,^① 如何确保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不受损害,^② 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当前中国需重点考虑的^③。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进路

中国出境政策的制度性松绑构成新移民增长的底层动力机制。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审查制度在 1985 年《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开始松动,至 1997 年《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后审批权下放至省级公安机关,2002 年公安部推行的按需申领护照制度更使护照持有率迅速增长。这一时期政策变迁释放的移民势能在东南亚获得了特殊的制度性承接:一方面,泰国、菲律宾等国通过旅游签证形成的“准居留”机制,客观上为新移民提供了 60~90 天的合法滞留期;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等投资移民政策虽设置较高门槛,却为高净值移民提供了合法居留渠道。值得关注的是,东南亚国家移民政策耦合效应催生了独特的“制度套利”现象,即移民通过多次短期签证入境累积合法居留时间,或利用落地签政策实现事实居留,而相关策略的转变,实质上是对传统推拉理论中经济梯度差单一驱动机制的补充,形成了以“制度梯度差”为核心的新型导向机制。这种机制使得现有移民治理体系面临双重结构性困境:国内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仍沿用 1985 年确立的“回国定居”认定标准,缺乏对长期滞留海外的“事实移民”分类管理机制;国际层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的双边移民协定多集中于 20 世纪 90 年代劳务合作领域,其条款设计难以适应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多元化迁移形态。此类制度滞后性在东南亚国家治理实践中尤为凸显。如马来西亚虽于 1996 年废除“华人配额制”,但教育资源分配中的隐性歧视仍导致华裔学生大学录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又如印尼“国籍证”制度废止后,华人社群仍面临身份证件审核的双重标准问题。

社会融合政策的缺位进一步放大了新移民的代际分化。中国的海外公民服务体系仍以领事保护为核心,缺乏针对移民长期发展的职业培训与教育支持政策;东南亚国家虽逐步放宽族群限制,但制度性歧视的历史遗产持续影响移民融入:第一代移民多依赖乡缘网络从事商贸活动,新生代移民则凭借语言优势通过高等教育体系实现阶层跃升。这种代际分化导致融合策略出现了分野,老一代移民倾向于构建族群聚居生存共同体,新生代移民则更注重突破文化隔阂融入主流社会。既有研究勾勒出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阶段性特征:1978~1992 年为中国新移民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流动主要依赖亲缘网络、非法移民占比较高;1992~2012 年为规模化扩张期,这一时期受经济驱动与政策互动影响,职业结构从传统商贸向服务业多元化发展;2013 年后进入结构升级期,技术移民与投资移民占比提升。研究仍需在时空和理论层面深入探索:时间维度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新趋势关注不足,空间维度上缺乏针对越南、缅甸等新兴目的国的系统性比较,理论维度上未充分结合殖民历史遗留的族群矛盾、当代国际关系变迁等因素解释中国新移民的特殊性。进一步来说,推拉理论对于经济梯度差缩小背景下中国新移民规模仍持续增长的现象难以解释,尤其对于数字时代跨境电商移民形态、华二代身份认同变迁,以及新移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在地化影响机制等来说,既需要跨学科理论创新,更依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协同,平衡劳动力需求与移民治理的人性化转型。

二、流变历程:三阶段迁移逻辑与动力重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东南亚的人员流动,不仅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与动力转换规律,其流变机制更深度嵌套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进程与东南亚国家政策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三维互动之中。通过解构 1978 年至今的三阶段迁移逻辑,可清晰观察到政策杠杆、经济梯度差与地缘战略如何通过制度性耦合重塑移民路径,而动力机制的重构则揭示了移民行为从个体生存理性向国家战略嵌入的范式转变,这种转变本质上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流动治理体系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动态调适过程。

① 农羽青. 东南亚低技术移民劳工人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以 COVID-19 疫情中的人权治理为例 [J]. 东南亚纵横, 2021, (4): 96-110.

② 代帆. 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及其影响 [J]. 东南亚研究, 2011, (2): 89-96.

③ 吴琳. 东南亚移民危机与移民治理:从“安全化”到“区域化” [J]. 东南亚研究, 2017, (5): 1-20.

(一) 政策驱动型迁移 (1978~1992): 家庭团聚主导的闽粤侨乡链式迁移

改革开放初期的移民潮本质上是政策解冻与历史网络共振的制度性产物。197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颁布虽未彻底放开移民限制,但“准许出境”原则的确立为公民跨国流动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制度的突破标志着中国移民政策从严格管制向有限松动的转型。此时期东南亚作为华侨华人传统聚居区,凭借其历史形成的社会网络与文化认同,成为政策红利的首要承接区域。量化研究表明,1978~1992 年间中国公民因私出境人数年均增长率达 25%,其中赴东南亚比例超过 60%,^①这种空间集聚现象与东南亚国家移民政策的宽松性及侨乡文化的历史积淀存在显著相关性。闽粤侨乡的链式迁移构成此阶段的核心图景,以福清江兜村为例,该村在 1978~1995 年间累计输出移民超 3000 人,形成“先驱者示范——亲属跟进——网络固化”的三阶段扩散机制。这种迁移模式的运行依赖于两大结构性要素:其一,海外侨胞构建的非正规支持网络具有显著的社会资本传递功能。施雪琴(2019)的田野调查揭示,闽粤地区每 100 名海外华侨平均可带动 5~8 名亲属移民,^②其功能不仅限于资金资助,更涵盖签证信息传递、就业岗位介绍等关键性资源供给,此种网络化迁移模式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其二,政策模糊地带创造的套利空间源于制度设计的非对称性。当时中国出入境管理实行“配额审批制”,而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在 1978 年恢复中国公民出国审批后,对探亲类签证审查标准存在明显的弹性空间,制度性缝隙客观上为新移民提供了合法化的跨境通道,形成独特的“制度套利”现象。

这类迁移的动力机制呈现明显的生存理性特征,其成本收益结构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数据分析表明,移民个体通过侨乡网络可将出境成本降低约 40%,而预期收入增幅超过 300%,^③这种经济激励构成了迁移行为的核心驱动力。但该阶段的移民流动始终处于政策灰色地带,从中国移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菲律宾、越南及其他国家的合法、非法移民大约有 60 万~80 万人,^④高比例的非法迁移现象反映出政策供给滞后于现实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看,此类矛盾本质上是国家移民治理能力与全球化人口流动需求之间的动态适配过程,其解决路径依赖于后续阶段的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最终推动了移民治理体系从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型。

(二) 资本扩张型迁移 (1992~2012): 经济规模化下的泰国留学政策催生的中产技术移民潮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形成了双重制度变迁动力,推动移民动机从生存需求向发展诉求转型。此阶段的核心特征表现为资本积累催生的主动型迁移,其中泰国留学政策催生的中产技术移民潮最具典型性。泰国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推行的教育国际化战略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加之汉语教学需求因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深化而持续增长,形成了独特的教育供给结构。全球化智库(CCG)(2024)的追踪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在泰留学生达 21 419 人,较 2012 年增长 130%,其中约 35% 毕业后选择留泰就业,主要集中在旅游管理、商科等领域。^⑤这种迁移的驱动机制呈现显著的复合性特征:微观层面,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教育投资能力提升构成了移民的经济基础;中观层面,东南亚国家政府通过“精英签证”等政策工具主动吸引国际人才,形成了制度性吸纳机制;宏观层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创造了跨国务工的市场需求,三者共同构成了移民动机产生的深层次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移民已突破传统侨乡网络限制,转而依托专业社群构建新型社会资本。以清迈为例,中国留学生群体通过校友会、商会等组织形成“知识移民圈层”,其职业分布从初期的餐饮服务业转向信息技术、金融管理等高附加值领域。这种转型折射出资本扩张型迁移的本质,移民不再仅是劳动力输出,更是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跨国流动,其社会资本积累方式从地缘性依赖转向业缘性建构,同时也反映出教育移

① 庄国土.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62-69.

② 施雪琴. 菲律宾华侨华人史话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9: 317.

③ 王赓武. 更新中国: 国家与新全球史 [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 125-138.

④ 庄国土. 近 30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 [J]. 世界民族, 2006, (3): 38-46.

⑤ 全球化智库 (CCG).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 (2023~2024)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10-15.

民政策与移民监管体系之间的制度性脱节,其背后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才流动治理的复杂性提升。

(三) 战略嵌入型迁移 (2013~2024):“一带一路”项目人员流动下的工程技术人员跨国调度制度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互动进入制度性合作新阶段,此阶段的战略嵌入型迁移以工程技术人员跨国流动为载体,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特征。中国企业通过构建“总部-区域中心-项目部”三级人才管理体系,实现了技术人员的规模化输出与精准配置。以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为例,中方人员配置呈现显著的多元化专业结构,涵盖了铁路建设、电力通信、土木工程等12个技术领域,其中中方人员达659人,与印尼员工形成1:4的用工比例。^①这种人员配置模式在印尼市场具有普遍性:2022年末在印尼的中国外派工程人员达23039人,劳务合作人员5576人,形成“技术输出+本地雇佣”的复合型用工体系。缅甸因中缅经济走廊建设,2013~2022年新增约30万工程及商贸人员,其中云南籍群体集中分布于缅北地区,从事资源开发与跨境贸易。^②技术转移机制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数据显示,累计培训印尼员工4.5万人次,覆盖焊接、电工等15个关键技术领域。^③(见表1)

这种迁移的动力机制呈现显著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国家层面,“一带一路”专项基金提供资金保障;企业层面,中国交建、中国中铁等央企建立海外人才库;个人层面,技术人员通过“项目制就业”获得高于国内同行业的薪酬待遇。但该模式也面临文化适应与制度摩擦的双重挑战,印尼劳工部调查显示,近半数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存在语言沟通障碍,且当地工会对中方企业的用工方式存在抵触情绪。^④这表明战略嵌入型迁移虽具有国家战略导向,仍需解决微观层面的社会融入问题,其本质是全球化背景下制度性移民与在地化治理的动态调适过程。

表1 2011~2022年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外派工程人员及劳务合作人员数量情况

年份	对外承包工程		对外劳务合作	
	派出人数(人)	年末在外人数(人)	派出人数(人)	年末在外人数(人)
2011	21 109	6 677	119	597
2012	3 523	6 866	139	737
2013	7 985	9 816	179	729
2014	15 689	15 468	272	867
2015	8 062	12 940	178	835
2016	11 252	15 433	394	1 002
2017	10 910	16 363	659	1 371
2018	15 896	20 928	1 098	1 935
2019	16 107	21 138	2 249	3 845
2020	13 781	18 158	472	1 171
2021	13 892	22 364	1 507	2 692
2022	14 116	23 039	4 597	5 576

数据来源:2012~2023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在东南亚的迁移逻辑经历了从“个体生存驱动——资本扩张驱动——国家战略主导”的三阶段范式转换,其本质是政策、经济、社会资本三大动力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最终形成制度化、组织化的迁移模式。改革开放初期,政策从严格管控转向局部松绑,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迁移势能。此阶段迁移以“个体生存”为核心驱动力,如闽粤侨乡群体依托血缘地缘网络,通过个体自发流动突破政策限制,形成分散的、非制度化的迁移形态;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资本流动成为核心动力机制。政策变迁不仅体现为“松绑”,更创造了资本扩张的制度空间,迁移方向围绕资本需求重构,即劳动力、技术等

①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雅万高铁项目用工情况报告[R]. 北京: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23: 11-14.

② 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 雅万高铁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报告[R]. 北京: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 2023: 13-16.

③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雅万高铁建设培训数据报[R]. 北京: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023: 11-18.

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劳工管理风险报告[R]. 北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2021: 45-47.

要素向资本集中区域流动,形成从资本牵引到个体响应的迁移模式。“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的提出标志着迁移逻辑进入“国家主导”阶段。政策工具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导,经济驱动从单一劳动力成本扩展至技术、资本、市场全要素配置,社会资本从血缘地缘升级为企业组织网络,三者共同推动迁移从“个体、资本无序流动”转向国家战略下的制度化、组织化流动。

从中可见,迁移范式转换的关键在于政策、经济、社会资本三大动力的协同升级。从政策梯度看,不同时期政策工具的功能发生质变:改革开放初期是“被动松绑”,市场经济期是“创造空间”,国家战略期则是“顶层设计”,阶梯演进最终构建了“制度供给-需求响应-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机制。经济因素层面,驱动维度不断扩展:早期闽粤侨乡链式迁移依赖历史华侨网络,泰国留学潮依托中国-东盟经济互补性,“一带一路”项目则锚定东南亚基础设施缺口。经济梯度的动态变化直接重塑迁移方向,从“单向低成本流动”转向“多要素协同流动”,进而带动社会资本形态持续升级,传统侨乡依赖血缘地缘、留学生群体构建专业社群、工程技术人员依托企业组织,推动迁移主体从“分散个体”转型为“有组织的群体”,迁移行为更具可持续性和战略协同性。因此,三阶段迁移逻辑的演变,本质是政策、经济、社会资本三大动力从“各自分散作用”到“系统协同升级”的过程,最终实现了从“生存驱动的无序流动”到“国家战略主导的制度化流动”的范式转换。这种转换不仅重塑了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群体特征,更推动了区域人口流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三、结构动因:接收国政策博弈与移民生存困境

改革开放以后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规模性流动,本质上是由多重社会结构要素交织形成的系统性现象。接收国的政策制定逻辑、地缘网络的功能演化以及族群经济的权力关系,共同构成移民生存状态的结构性框架。这一框架既包含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治理机制与历史路径依赖,也涉及跨国流动中的制度性摩擦,其动态平衡既孕育着发展机遇,亦生产出深层的系统性困境。

(一) 经济利用与社会排斥的二元政策的悖论呈现

东南亚国家对移民的态度始终处于“经济需求”与“社会控制”的辩证张力之中。这种矛盾性政策范式的形成,可追溯至殖民遗产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双重历史进程。在殖民经济体系中,华人作为“中间人”被嵌入“殖民者-华人中介-土著”的三级结构,^①其经济功能虽被殖民者强化,却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地位。二战后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各国政权既需要华人掌握的商业网络推动资本积累,又担忧华人社群的经济优势威胁本土族群利益。些类矛盾心态最终转化为“经济利用与社会排斥”的政策悖论——通过选择性准入制度将移民的经济贡献纳入国家发展框架,同时以社会规训手段限制其权力扩张。

菲律宾的移民政策演化清晰展现了这一悖论的运作机制。《菲律宾移民法》虽未明确限制中国移民数量,但通过“投资签证”“特别退休居民签证”等工具性制度设计,将移民准入资格与经济资本直接绑定。这种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1998~2003年间至少2200名中国公民通过特别投资居留签证入境,^②短期内缓解了国内资本短缺;另一方面,宽松的审批标准导致签证滥用现象泛滥,至2021年菲律宾移民局数据显示被驱逐外国人中93%为中国公民,^③暴露出政策监管的失效。新加坡虽吸引技术移民,但政策隐含“经济利用优先”导向,2020年华人永久居民约30万,但社会福利准入仍设门槛(参见表2),这些制度漏洞客观上为新移民提供了滞留空间。

政策的内在矛盾根植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多数国家依赖外资驱动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廉价劳动力维持成本优势,而中高端服务业则渴望技术人才提升竞争力。这种结构性需求催生了“选择性吸纳”的移民政策:对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开放绿色通道,但对低端劳动力实施严格限制。在马来西亚,制造业可雇佣外籍劳工的比例高达35%,但服务业仅允许15%。^④可以说,中国

① 孔飞力.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M]. 李明欢,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51-58.

② 李明欢. 菲律宾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及其对中菲关系的影响[J]. 南洋问题研究,2008,(3):45-46.

③ 菲龙网. 中国公民占比91.5%[EB/OL]. [2022-01-01]. <https://bbs.phhua.com/thread-193319-1-253.html>.

④ 谢国祥. 马来西亚外籍劳工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J]. 南洋问题研究,2004,(4):25.

新移民因语言文化亲近性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多集中于商贸、建筑等政策模糊地带，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缺口，但同时又因身份合法性困境承受系统性排斥。

表2 2000~2020年新加坡历次人口普查中出生地为中国的常住人口数量情况

年份	2000	2010	2020
总人数	145 876	175 155	169 038
男性人数	65 320	72 711	64 728
女性人数	80 556	102 444	104 310

数据来源：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https://tablebuilder.singstat.gov.sg/table/CT/8187>。注：2000年、2010年的数据包含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2020年的数据仅为中国大陆的数据。

（二）地缘网络的功能二重性与路径依赖

据此，地缘网络作为中国新移民在东南亚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托，其作用机制呈现出显著的功能二重性，如闽粤侨乡网络作为历史遗产，在改革开放后通过“链式迁移”模式被重新激活。以福清江兜村为例，侨眷通过海外亲属网络获取签证信息、经济资助与就业机会，构建起跨越国界的互助体系。这种网络虽显著降低迁移成本，却强化了移民的路径依赖，新移民往往重复先驱者的职业选择，导致产业同构化竞争加剧，形成“移民-产业锁定”的恶性循环。

商会组织作为地缘网络的现代形态，其功能分化进一步凸显了网络的双刃剑效应。在积极层面，闽商商会通过资源整合推动产业链嵌入，利用血缘与文化认同，降低跨境合作壁垒。泰国中华总商会作为百年侨团，该会联合汕头市政府推动纺织服装、玩具、大健康产业进入泰国，并计划在数字经济、跨境电商领域复制“侨商+侨乡”模式，形成区域化产业闭环。^① 此类组织不仅增强移民的经济竞争力，更推动中国标准、技术与东南亚市场的深度融合。但在消极层面，商会网络的封闭性加剧了族群经济隔离。菲律宾华商联合会2015年数据显示，马尼拉华人零售业市场份额长期维持在42%以上，金融业占比更高达78%。^② 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布局引发本土商人的系统性排斥，2012~2015年3次反华游行均以“抵制中国商品”为口号，实质针对华人商户的经济垄断。马来西亚华人通过“第二家园计划”形成跨国商业网络，缅甸的中国新移民呈现地域分化，云南籍集中在缅北，福建/广东籍分布在缅东南，多从事商贸与加工业。同时，更隐蔽的隔离还体现在社会资本层面，华人企业偏好雇佣同族员工导致就业市场相对封闭，跨族群商业合作也多限于表层交易缺乏深度信任机制（表3）。

表3 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的地域分布及从事的职业情况

国家	地域分布	从事的职业
新加坡	主要居住在新加坡市	主要从事金融、贸易、航运、物流、科技、教育、医疗和服务业等领域
菲律宾	大部分居住在吕宋岛，尤其是大马尼拉地区	是菲律宾许多产业部门的主导力量，在进口贸易、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泰国	大部分居住在曼谷、清迈、普吉等地	从事的工作较为广泛，包括商业贸易、旅游业、餐饮、农业等
文莱	在文莱四个行政区均有分布，以文莱—摩拉区和马来裔区居多	多数从事建筑、修理、餐饮和销售业等
印度尼西亚	主要居住在雅加达、泗水、棉兰、万隆和梭罗等城市	在商业、金融、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均有涉及，在印尼商贸和工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帝汶	主要聚集在首都帝力	主要涉足农业、能源和矿业、旅游业、贸易等行业

① 华人号. 汕头市人民政府陳濤市長率經貿代表團訪問泰國中華總商會，共敘鄉情，共促發展 [EB/OL]. [2025-07-10]. <https://www.52hrtt.com/xg/n/w/info/D1752028134249>.

② 菲律宾华商联总会. 菲律宾华人经济发展白皮书 [R]. 马尼拉：菲律宾华商联总会，2020：23-25.

续表 3

国家	地域分布	从事的职业
马来西亚	主要集中在檳城、吉隆坡、乔治市、怡保、新山、古晋、亚庇和马六甲等地区	主要从事商业、金融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形成了“马来人主政、华人主商”的格局
柬埔寨	主要分布在金边市及马德望、干拉、贡布、茶胶等省	广泛涉足于进出口贸易、日用百货、旅游餐饮、食品加工等多个行业
老挝	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聚居在首都万象和沙湾那吉、巴色、琅勃拉邦等省会城市	多数从事于农业、餐饮、旅社、服装、食品加工、日用百货、土产、酿酒、碾米、锯木、机械维修等传统行业
缅甸	遍及全缅各省、邦，相对集中在大中城市，云南籍侨胞主要集中在曼德勒、腊戍、当阳、景栋、密支那、八莫、木姐、大其力等缅北地区，福建和广东籍侨胞相对集中在仰光、勃生、彬文那、毛淡棉、土瓦、丹老、妙瓦底等缅东南地区	涉足缅甸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主要集中在商贸业、服务业、加工制造业、农林渔牧业等
越南	主要分布在胡志明市及同奈、平阳、林同、广宁、海防、茶荣、坚江、后江等省市，其中，胡志明市第五郡（堤岸）是华人相对集中的地方	大多经商，经营的行业包括零售、批发、餐饮和制造业等

资料来源：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和网络资料。

（三）族群政治的历史遗产与当代重构

东南亚国家的族群政策构成移民生存困境的深层结构背景。殖民时代的“分而治之”策略在独立后仍有遗存，逐步形成以“本土优先”为核心的政治正确原则。印尼在《1954 年堡垒政策》影响下，1959 年，苏加诺政府进一步颁布《总统 10 号令》，禁止县以下外侨（主要为华人）从事零售业^①，迫使华人资本转向进出口贸易；马来西亚《1971 年新经济政策》^② 设定马来人经济配额，间接挤压华商发展空间。此类政策虽未直接针对中国新移民，却导致华人社群被迫在有限领域内过度竞争，新移民的进入进一步激化资源争夺。

与此同时，宗教因素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印尼作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其《1998 年第 39 号人权宣言》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地方层面对华人习俗的限制屡见不鲜。坤甸骚乱后，警方仅称事件为“个人纠纷”，未追究族群仇恨动机，^③ 此类冲突表面上是文化差异，实质是本土宗教势力与外来经济力量的博弈。教育体系的族群隔离则进一步固化社会分层。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坚持普通话教学，与国民学校的马来语教育形成平行体系，导致华人学生难以进入主流社会晋升通道。泰国虽未禁止华文教育，但公立大学对华裔学生的录取比例长期偏低，迫使华人家庭依赖私立高校完成阶层跃升。这种教育隔离使新移民后代既无法完全融入本土社会，又与祖籍国存在文化疏离，形成独特的“边缘人”群体。

（四）制度缝隙中的策略性适应与结构性矛盾

面对多重结构性困境，新移民发展出多层次的适应策略，其实践逻辑折射出制度缝隙中的生存智慧。经济层面的“灰色经营”成为新移民的普遍选择。菲律宾中国商城商户普遍使用旅游签证进货并通过现金交易规避税务监管；泰国代购群体利用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滞后构建跨国供应链。诸如此类策略虽提升短期经济收益，却强化了移民的非法化标签，加剧社会排斥。社会层面强化“文化资本转化”。印尼华人创办双语学校将华文教育与国民课程结合，马来西亚华人商会赞助马来族艺术家推动跨文化对话。但此类努力的效果受制于宏观政策环境，泰国《2018 年国籍法》修订虽简化入籍程序却增设语言能力测试门槛。政治层面加强“利益捆绑”策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中资园区推行“雇佣本地化”政策要求企业

① 新加坡新闻网. 1966 年印尼撤侨：海军舰队前往示威，战士乔装客轮船员救回同胞 [EB/OL]. [2022-05-12]. <https://www.xinjiapo.news/news/318077/amp>.

② Jomo K S. Whither Malaysia's New Economic Policy? [J]. Pacific Affairs, 1990, (4): 469-499.

③ 数千人焚烧华人庙宇住宅 [EB/OL]. [2007-12-10]. <https://news.sina.com.cn/o/2007-12-10/144713052746s.shtml>.

40% 员工为柬埔寨籍^①; 缅甸密支那中缅合资企业设立社区发展基金资助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此类实践试图通过利益共享消解族群矛盾, 但其可持续性依赖东道国的政策稳定性。

上述现象可在经典移民理论框架中获得新的解释维度。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边缘”范式揭示了东南亚国家的结构性困境: 作为半边缘区域, 其既需中国资本弥补发展短板, 又警惕经济依附风险。^② 这种矛盾心态转化为“经济实用主义”政策, 即在短期吸纳移民劳动力维持经济增长, 长期限制其社会权利以规避政治风险。单纯强调中国推力与东南亚拉力无法解释政策打压下移民仍持续增长的悖论, 实质是移民网络创造的“制度套利空间”形成了第三种拉力机制。

四、现实回应: 代际转型的主体性重构

(一) 从劳工到跨国精英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 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流动呈现出显著的代际转型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 菲律宾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吸引了大量来自福建闽南地区的底层劳工。这些劳工主要通过家庭团聚、劳务输出等途径进入菲律宾, 从事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菲律宾的中国新移民中, 移民多从事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低端职业。这些劳工在菲律宾的生存环境较为艰苦, 面临着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社会排斥等多重挑战。进入 21 世纪,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 中国新移民的流动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2020 年, 泰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中国学生。这些留学生毕业后, 部分选择留在泰国创业, 形成了新一代的跨国精英群体。根据泰国教育部门的统计, 2020 年泰国接纳了超过 14 403 名中国留学生, 其中约 30% 选择在毕业后创业。^③ 这些留学生创业群体主要集中在科技、教育和金融等领域, 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 推动了中泰两国在高科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由此可见, 身份认同的裂变与整合是新移民代际转型的重要表现。二代移民在身份认同上呈现出明显的裂变趋势, 二代移民在本土参政率较低, 仅为 5% 左右, 而在跨境商业网络中的参与率则高达 82%。^④ 一方面, 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构建跨境商业网络; 另一方面, 他们在政治参与和社会融入方面仍面临较大障碍。这种身份认同的裂变与整合现象, 反映了新移民在适应新环境过程中的复杂心理和社会动态。

(二) 文化调适策略的代际分野

老一代中国新移民在东南亚的生存策略多以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为主。在印尼, 部分老侨为了在当地社会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选择了宗教改宗。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 印尼的华人社群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宗教改宗现象, 许多华人为了融入当地社会, 改信伊斯兰教或基督教。这种宗教改宗不仅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也是为了在当地社会中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与老一代移民不同, 新一代中国新移民在文化调适策略上表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他们通过华文教育和文化资本输出,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由华侨华人组织的众多国际性华人社团联谊活动在东南亚国家成功举办, 极大地加强了华人群体的自我认同。^⑤ 如 1971 年由张发奎将军发起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至今已累计举办了 31 届, 举办规模从第一届的 250 人扩大到逾 3000 人、100 多个客家组织,^⑥ 在整个东南亚华人群体中影响力极大。截至 2016 年,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数量已经多达 25 000 多个,^⑦ 成为“支持海外华人社

①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 (CDC). 投资法实施条例 (2010 年修订) [Z]. 金边: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 2010: 15-18.

② 韦红. 印尼国内政治对中印共建海丝的影响 [M]. 东南亚研究, 2017, (4): 45-56.

③ 亚洲院校网. 2020 年赴泰留学生情况汇总: 超过一半的国际学生是中国人 [EB/OL]. [2023-04-28]. <https://asia-university.cn/media/813>

④ 李明欢. 欧洲华人商城经济研究 [J]. 世界民族, 2013, (3): 53-60.

⑤ 张淑雯. 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 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J]. 东南亚研究, 2022, (6): 134.

⑥ 巫秋玉. 论“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与中国客家侨乡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8, (1): 46-57.

⑦ 纪娟丽.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数量达 2.5 万多个 [N]. 人民政协报, 2016-05-18 (1).

会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与发展的象征”。^①

新移民的代际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回应。20 世纪 90 年代,东南亚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吸引了大量中国底层劳工。进入 21 世纪,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新一代中国新移民凭借自身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迅速适应了这一变化,成为推动东南亚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这种代际分野不仅反映了移民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适应策略,也揭示了他们在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方面的深层次变化。老一代移民的宗教改变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们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但也使得他们在文化认同上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特色,陷入了文化同化的困境。相比之下,新移民通过华文教育和文化资本输出,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上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影响力。

这种代际分野可以用文化适应理论和代际传递理论来解释。文化适应理论认为,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会采取不同的适应策略,以应对文化差异和社会排斥。老一代移民由于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往往采取更为被动的适应策略,以求得在当地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而新移民由于具有较强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能够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适应策略,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代际传递理论则强调,移民的适应策略和文化认同不仅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还受到家庭和社会网络的影响。老一代移民通过家庭和社会网络将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适应策略传递给下一代,而新移民在继承这些传统和策略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教育背景和国际视野,进行了文化创新和社会适应。据此,新移民的代际转型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更是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适应策略调整的必然产物。通过深入分析这种代际分野,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新移民在东南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他们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三) 文化适应与身份重构

新移民在文化适应和身份重构过程中,面临着多重挑战。他们需要新的文化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他们还需要在文化认同上找到平衡点,既要保持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又要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由此,新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往往会采取“选择性适应”策略,即在某些方面保持原有的文化习惯,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积极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新移民的代际传承与文化创新是代际转型的重要表现。老一代移民在东南亚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和经验通过家庭和社会网络传递给下一代。新移民在继承这些资源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教育背景和国际视野,进行文化创新。例如,在马来西亚,许多新移民通过创办华文学校和文化交流中心,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传播。可以说,新移民的代际转型也是对社会结构融合与重构的回应。新移民的代际转型还是对文化结构调整与创新的回应。老一代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往往采取保守的策略,保持原有的文化习惯。新移民则更加开放和包容,他们通过华文教育和文化交流,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创新。

由此可见,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代际转型,是多重社会结构交织作用的产物。从劳工到跨国精英的阶层跃迁,反映了移民主体性的提升与经济结构的转型;文化调适策略的代际分野,揭示了移民在文化适应中的主动性与创新性;身份认同的裂变与整合,则体现了移民在社会结构中的融合与重构。

五、小结:移民研究的视角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流动现象对传统移民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与修正需求。传统的推拉理论强调经济梯度差作为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力,但在东南亚情境下,政策导向与制度环境对移民流的塑造作用更为显著。例如,泰国和菲律宾的签证政策漏洞为新移民提供了“制度套利”空间,使其通过旅游签证入境后滞留并就业。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显示,2015~2020 年间东南亚中国新移民中 68% 最初以旅游签证入境,其中 42% 通过非正规途径延长居留期,形成“旅游——滞留——就业”的转化链

^① 赵阳. 前景光明 海外华文媒体正处在蓬勃发展期 [EB/OL]. [2017-09-04]. 中国侨网 <http://www.chinaqw.com/zgqj/qjdt/200709/04/86285.shtml>.

条。^① 这种“制度梯度差”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考量, 成为移民决策的关键因素。同时, 东南亚宗教冲突抵消经济拉力。宗教因素在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中扮演了复杂角色。尽管经济机会是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 但宗教冲突和文化隔阂显著影响了移民的长期融入。爪哇地区部分清真寺发布教令禁止穆斯林光顾华人商铺, 苏门答腊岛的伊斯兰团体多次抗议华人焚烧纸钱习俗, 形成经济活动与文化冲突并存的局面。这些现象表明, 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抵消文化与宗教因素带来的社会排斥。^② 由此可以提出跨国主义视角的本土化修正, 即新移民不仅依赖跨国网络, 还积极参与本地社会建设。如在菲律宾的中国新移民通过创办双语学校和参与社区服务, 推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与合作, 用“跨国摆渡”模式积累社会资本, 这种“脱域—再嵌入”反映了移民在保持跨国联系的同时, 逐步融入本土社会的过程。^③ 在此基础上, 还叠加了侨乡网络从血缘纽带 (1970s) 向资本纽带 (2010s) 的转向。又如, 2010 年以来,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商通过商会组织, 构建了跨国的商业网络, 印尼雅加达福建商会通过“建材采购联盟”整合供应链, 推动技术与资本的跨国流动, 使华人企业在当地建材市场的份额提升至 38%。^④

综合上述各类因素, 可构建对东南亚中国海外移民代际转型的“脱域—再嵌入”理论构形: 即代际转型进程中, 新移民群体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脱离到重新融入异质文化场域的系统性转变: 老一代移民主要依托侨乡地缘网络, 多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 其社会嵌入模式带有显著的乡土文化印记; 而新移民则通过教育赋能与职业升级, 实现了生存策略的现代性跃迁。据调研所得, 以越南的新移民实践为例, 新移民群体通过创办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华文学校及文化交流中心, 在当地社会构建起兼具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新型嵌入载体。此外, 技术移民群体在东南亚流动中展现出数字化时代的社会资本重构能力, 如在印尼的技术移民案例中, 他们借助 LinkedIn 等专业社交平台与当地企业及行业精英建立跨文化联结, 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会网络建构方式, 既为移民群体拓展了职业发展空间, 也推动着技术知识流动与文化双向对话的深度融合。上述代际差异本质上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移民群体从依托传统地缘纽带到借助数字技术重构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其“再嵌入”过程也通过文化创新与技术赋能呈现出多元且动态的现代特征。

Southeast Asian New Chinese Migrants: Rheological Mechanisms, Structural Tens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ition

DONG Xiangyun, XU Rong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new immigrants in Southeast Asia has exhibited dynamic rheological mechanisms, structural tens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core question, which is what factors drive this migratory flow, and how doe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occ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policy ori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shape migration patterns, with systemic loopholes in Southeast Asian visa policies serving as a primary driver of "institutional arbitrage", exerting greater influence than economic factors. Religious conflicts and cultural barriers hinder social integration, whil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ail to overcome these non-economic constraints. New immigrants leverag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to achieve "deterritorialization-reembedding" in local societies. Findings indicate structural dilemmas within migrant communities, ye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ttains upward mobility through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restructuring, simultaneously facilitating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migration evolutio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Key words: structural tensi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rheological mechanisms

(责任编辑: 阮明阳)

①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南亚中国新移民迁移路径研究 [M].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 2021: 45.

② 韦红. 印尼国内政治对中共共建海丝的影响 [J]. 东南亚研究, 2017, (4): 48.

③ 李明欢.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移民与族群关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78.

④ 庄国土, 陈君. 1980 年代以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 [A]. 21 世纪出入境 (移民) 管理研讨会论文集 [C]. 汕头: 汕头大学法学院, 2008: 155-163.